

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协同及财政积极作为

刘昊¹ 陈工²

(1.温州商学院,浙江 325035;2.厦门大学,福建 361005)

内容提要：全力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战略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基础之上,是党和政府应对复杂形势的主动选择,二者互为掎角,相互协同,内在统一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需规模扩大和层次提高能够为共同富裕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而促进共同富裕和形成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能够扩充各个层面的有效需求。社会主义财政要全面深化税制改革、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政府投资机制、政策工具多管齐下,以有效支持好、协同好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财政支持全力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衔接短期与长期、统筹内需与外需、协调财政与金融,以及平衡赤字与安全。

关键词：扩大内需 共同富裕 战略协同 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2)07-0012-10

一、引言

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保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的战略动力,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和防范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战略依靠。自2020年以来,中央层面多次强调扩大内需战略,是内外部发展环境条件变化下党和国家对经

济发展形势、发展动力和发展路线做出的重要判断,也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动选择。

新形势、新阶段和新格局下,全力扩大内需有丰富的内容和更高的挑战。全力扩大内需,除了有将经济发展动力由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的涵义外,更具有调整内部需求结构、释放内部需求潜力和提升需求质量层次的重要内涵。全面扩大内需意味着,要真正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要全

[收稿日期]2022-07-05

[作者简介]刘昊,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管理;陈工,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绩效管理导向下的中国政府成本体系研究(20&ZD115);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业上楼:工业用地新模式的逻辑机理分析及浙江应用可行性评估(LGF22G030011);温州市基础性公益科研项目:房地产与地方债务共同诱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机理分析与防范对策(2021R0016)。

面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全面唤起民间投资意愿和提升民间投资水平；要将全面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通过供给创造需求和需求牵引供给推动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维持经济稳健向上的运行趋势。

但这些扩大内需的任务达成目标、取得成效面临着诸多因素制约，存在着大量待破解的经济和制度桎梏。一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与家庭、企业各部门间分配不均衡，家庭居民劳动报酬分配占比较低，资本和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税收占比较高，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收入差距较大程度上制约着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提高。二是由于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负担，居民将大量收入用于住房投资和预防性储蓄，消费潜力提升困难。三是我国城市城镇化进程已近 65%，城市常住人口难以持续增长，城市基础和公共设施保有量也大多处于饱和状态，继续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边际效应都在降低。四是由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等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叠加经济下行和贸易冲突、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除部分头部和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大量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处于投资能力不足和投资意愿不高的状况。

解决以上诸多扩大内需的问题，需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收入分配、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公共治理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建立健全法律和政策体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收入依法公平分配，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尤其需要在收入分配方面下功夫，收入分配有序合理，各类内需才能有

坚实的物质基础，各类主体才能有归属感和责任感。而收入分配的价值目标便是全面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现实目标，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现代化国家层次的重要标志。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二者互为手段，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战略。

本文以历史的、逻辑的方法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战略或行动的动态演变，展现二者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的时代变迁；并解析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阶段下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二大战略的内在关联；最后讨论财政如何积极作为支持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

二、扩大内需与共同富裕战略的历史演进

（一）扩大内需战略的提出与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两个重要的驱动力：对内方面，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解除了桎梏经济发展的枷锁，给市场主体参与生产活动和价值创造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对外方面，倡导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内的人口红利，吸引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在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贸易规则等方面，主动与世界接轨，通过不断累增的出口，支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王建，1988）。尤其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至 2018 年中美爆发贸易

摩擦,实际 GDP 年均增速高达 9.5%,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为 12.9%。

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实施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过程中,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和出口市场需求的变化,重视内需市场和扩大内需也不断成为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调控经济的着力点。1998 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重视和扩大内需。自此,扩大内需战略开始成为我国政府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和外部冲击的重要政策工具。1998 年扩大内需的渠道主要包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政府投资、通过住房和汽车领域改革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等提升居民消费等(王一鸣,1998)。从实施效果来看,1998 年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宏观政策,维持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但是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过度或过快市场化改革也给居民消费带来了不利影响,以及政府投资活动挤出居民消费,最终导致消费率从 1998 年的 60%下降至 2008 年的 50%,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 45%左右下降到 35%(巴曙松,2009)。2008 年,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我国扩大内需政策主要是通过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发挥经济稳定职能,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并由此不断积累了地方政府债务。

扩大内需的政策表述体现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中。通过梳理这些政策文件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对支持和扩大内需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重视各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不同需求之间的结

构调整,以及需求与供给两者的相互促进。尤其是自 2020 年 7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要求以来,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和内部需求的巨大潜力,提升国内需求的水平和层次,从而更好更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以及近两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把“坚持扩大内需”“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列为重要工作重点。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

(二)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与推动

党中央所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毛泽东时代。1953 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首次出现了“共同富裕”的相关表述,指出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 1985 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并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共同富裕的两段论,即第一阶段“允许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第二阶段“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高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责任心和使命感将“共同富裕”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高度。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从一种理念转变为一种国家发展阶段的目标(李实,2021)。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021年5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选择浙江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打造共同富裕的省域范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诸多利民的成功经验，形成了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充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理论的重要论述和引领我党和我国人民为促进共同富裕所做出的伟大实践，是建立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习近平同志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重要文章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三)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战略在新时代交汇

从扩大内需战略发展的时间线上看，我国主要在1998、2008以及2020年这三个重要时间点突出

强调了扩大内需战略。三个时间点的扩大内需战略或政策的实施有一些相似之处，均是在外部需求受到冲击时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宏观政策选择。不同之处在于前两个时间点外部冲击较为简单，均来自于国际或区域金融危机，而且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制度红利还具有非常高的比较优势，因此宏观政策的实施难度较小，政策执行效果见效较快。而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有中美贸易摩擦、局部地缘战争和新冠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内部有人口红利消失、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能转化等诸多挑战。全力扩大内需是供给侧改革已经取得重要成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现实要求。

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和推进工作实施时间点来看，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在经济物质财富体量够大但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背景下提出来的(周文和施炫伶,2022)，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通过改革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可以更好地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者的良性循环。

因此，当前全力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战略的提出具有时间点上的一致性、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的关联性。二者均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基础上，同时也是应对复杂形势的主动选择，体现了我党伟大果敢的政治魄力和经济洞察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过程中，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战略二者共行发展，在时代选择下交汇。

二者发展时间线和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三、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关联

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二者互为犄角，相互协

同，内在统一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扩大内需、完善内需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再为扩大内需提供动能保障。具体逻辑机制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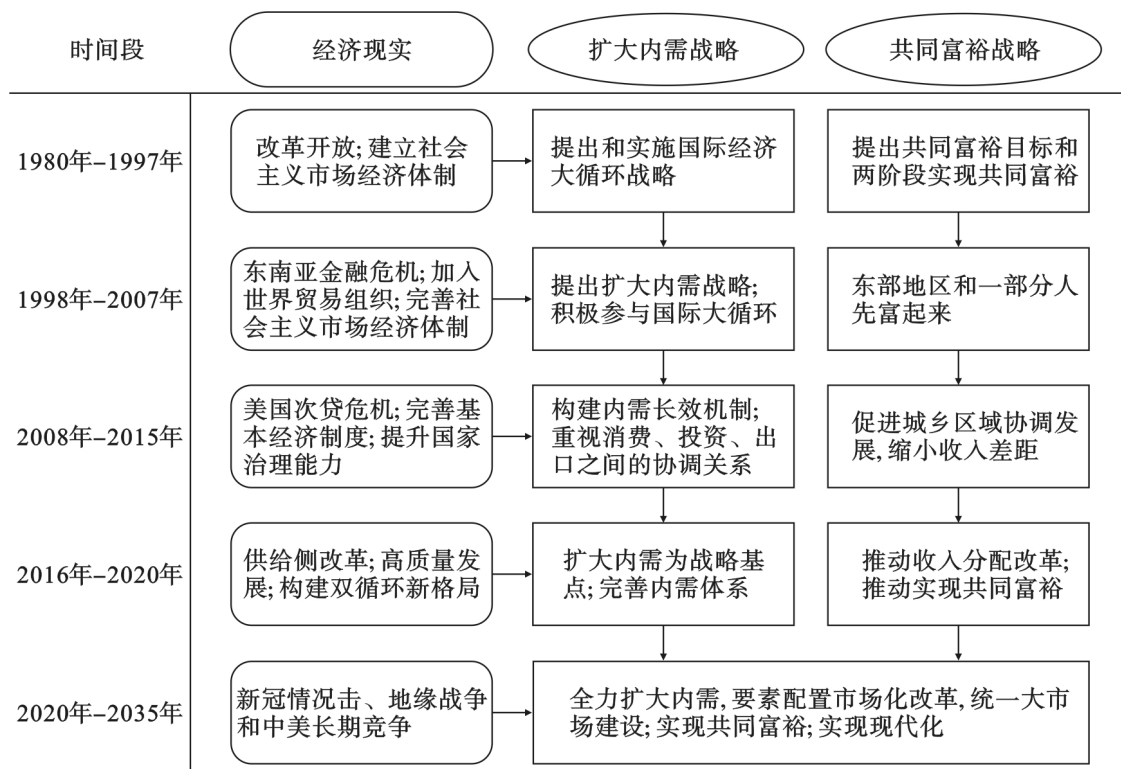


图 1 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共行和交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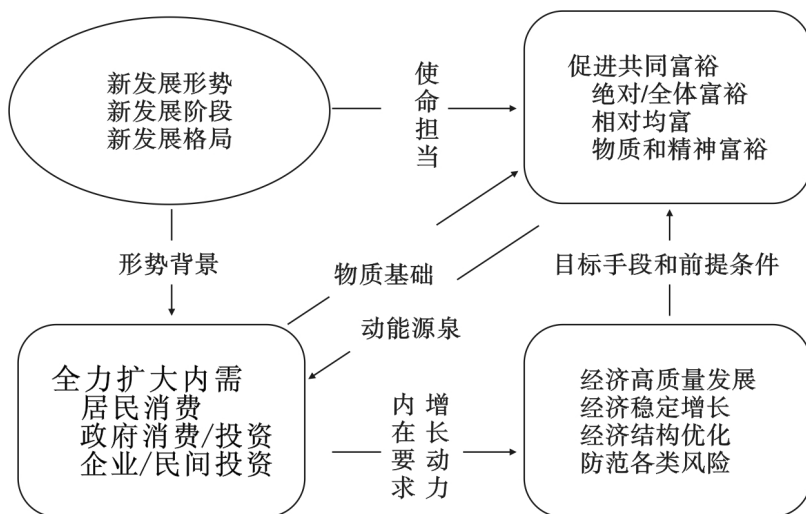


图 2 扩大内需、共同富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逻辑

（一）扩大内需为共同富裕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

我国的内需市场主要有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包括民间投资)四个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下全力扩大内需涵义十分丰富,既包括内需总量规模的扩大,也包括内需组成体系的优化和需求升级。

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再循环开启的连接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的提高,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从而不断做大经济蛋糕,为居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此外,居民消费本身就可以提升人们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例如居民对文化生活等服务品消费能够提升人们的肌体和心灵享受,对耐用品的消费能够帮助积累财富资产。从这层意义上讲,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的消费本身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

政府消费可以为人们提供均等化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增加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事业的消费性支出,提升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率和公平程度,能够有效减轻和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支出负担,发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作用。普惠共享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可以帮助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是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工具。

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在作用发挥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但也不完全一致。政府扩大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是政府提供优质普惠公共服务的前提,在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一起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同时,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投资,是直接为经济发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城市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和创造财

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投资在调控经济、维持经济平稳增长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科技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力军。民营经济要发展壮大,必须持续进行物质资本积累和加大科技投入。将民间投资维持在合适的增长水平上,是全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民间投资水平提上去了,我国经济发展将具有更强的韧性,从而保持低水平的失业率,维持并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家庭收入,并配合再分配制度,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的动能源泉

共同富裕不是追求分配结果的完全等同,而是追求机会、过程的平等,同时注重结果相对平等,即大家都能处于绝对富裕的水平,同时个体之间收入和财富水平差距不能过大。不断促进共同富裕,是全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

首先,共同富裕能够创造更大的内需规模。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内需水平提高的主要短板就是家庭消费率较低。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劳动者所得份额更大,能够有效提升居民消费;同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的存在,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从而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家庭居民消费。家庭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后,再通过乘数效应和传导效应,提升企业和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水平,从而全方位扩大内需。

其次,共同富裕能够创造更高层次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在收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家庭居民将会释放巨大的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潜力。高层次的需求引致高质量的生产和供给,从而推动生产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以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更好功能和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差距缩小后,也会推动政府提供质量更高的公共服务,进而推动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促进共同富裕,也意味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好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职责作用,提升政府有效占有和使用经济资源的能力,不断完善政府投资机制和再分配机制。

第三,共同富裕理念能够重塑社会责任感。在共同富裕目标指引下,政府会自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调整公共支出的领域,强化公共支出的责任感,提高政府支出的成本意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从而不断强化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效益性。由于我国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在思维惯性和社会文化惯性下,企业家或者拥有资本的阶层对共同富裕的理解还有偏误,甚至抵触。一旦建立健全共同富裕制度体系,形成充分保护产权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后,企业家或者拥有资本的阶层必然会在法律框架下调整其生产经营理念,重塑社会责任感,逐步让利劳动者,提升劳动者报酬份额,保持持续稳定的民间投资水平。

(三)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统一交汇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上所述,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由共行发展趋势转变为战略交汇融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二大战略也能够相

互促进,互相支持,形成战略协同。但需要看到,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较多待研究处理的难题和关键问题。实现二者有效协同,必须将二者统一交汇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下进行。

要紧密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好内需各部分此消彼长的问题和矛盾。提升家庭居民消费率,重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降低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大额支出负担。这需要降低中等收入阶层的税负,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可能会提高财政赤字率,抑制政府投资和消费。同样的道理,鼓励民间投资或者企业投资行为,也会对政府财政收支造成影响。全力扩大内需,要吸取 1998 年和 2008 年两次内需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具有宏观调控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双重功能,要合理确立政府的经济行为边界。

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低效、过度依赖低端工业品出口和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型发展模式,要全面理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做大蛋糕、做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是妥善协调处理好社会各阶层对收入分配诉求。因此,共同富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这意味着要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把握好共同富裕推进的力度、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时点,将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各项法律制度完备、共同富裕理念深入人心的基础上。

四、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财政作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对此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通过“为人民理财”和“管理国家风险”,可以有效融合公平与效率,调节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三个维度的利益关系(刘尚希等,2022),全力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

(一)财政可有效协同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财政所承担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三大职能与扩大内需、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社会主义财政在三大职能履行过程中,可以有效支持好、协同好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

从资源配置职能角度讲,财政可以通过针对性的支出政策调节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配置,处理好政府投资、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等内需各层次关系,构建具有持续增长动能和支持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体系;也可以通过资源配置,为城乡家庭居民提供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均衡通达的基础设施,从而为人民提供公平发展机会,加速社会流动,促进共同富裕。

从收入分配职能角度讲,财政可运用税收政策构建更有效率的初次分配,通过转移支付做好更加注重公平的二次分配,从而将经济蛋糕在政府与社会、社会各阶层之间合理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在完善收入分配结构中,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收入份额,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提升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循序渐进地调整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过高份额,以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原则建立资本与劳动的合理分配格局,防止打击企业和民间投资意愿。

从宏观调控职能角度讲,财政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可以发挥好经济“自动稳定器”作用,通过积极或稳健的财政政策做好经济的逆周期调节。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在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时体现的更为重要。2017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并积极进行地方债扩容,维持政府高投资水平,在保增长和保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保持一定的赤字水平和政府债务率,保障了政府投资、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各层次国内需求的稳定,有效防范了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为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和物质基础。

(二)财政政策支持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既要遵循公平原则,解决市场机制失灵导致的公共品提供不足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也要遵循效率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以市场效率原则合理安排财政各类支出,优化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以最小的公共支出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需要超前发力,打足提前量,全力支持扩大内需,注重提升政策效能;兼顾社会公平,通过发挥财政政策的直接乘数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将经济增长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稳定社会就业,保证经济社会稳定。

二是衔接短期与长期。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需要循序渐进、分阶段、有节奏的推进,需要配套完善的基础性制度。而财政制度是基础性制度的核心内容,要在短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展财政制度的前瞻研究和长期建设。

专题策划：财政与扩大内需

紧密围绕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短板扩大内需,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财富水平,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求,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三是统筹内需与外需。开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来自于内需和外需两个市场,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来动态调整内外需的结构比例。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内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持续有力的国内需求是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盘,是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的底气所在;而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可以与世界经济、科技和优秀文化发展保持同步,是保持国家文明和社会发展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前提条件。

四是协调财政与金融。财政与金融协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关社会公平、人民福祉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同时也是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财政金融二者要有效配合、协调增益,避免二者冲突或搭配不力导致政策效果折扣(陈工和刘昊,2020)。

五是平衡赤字与安全。财政支持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会带来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叠加税收减少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可能推高财政赤字水平,这会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财政可持续造成较大压力。这就需要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强化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确保地方财政稳定运转,防止部分地区财政出现破产风险;同时要紧密监控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做好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发行和融资平台贷款的续贷,拉长债务期限,降低融资成本,合理安排好地方债的偿债计划(刘昊,2021),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保

障地方财政安全。

(三)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处于风险矛盾的易发期,财政支持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现实紧迫性和时代意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财政改革、注重更加精准,统筹好规划好财政政策的设计实施,全面提升财政政策的实际效能。

第一,全面深化税制改革。从整体看,政府要降低经济宏观税负,为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要体现差异性,重点对中小微企业退税减税降费,对垄断性和暴利行业应强化税收遵从和规范征缴,防止政策偏置。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通过调整税率大小和累进区间,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群体和超级富豪的纳税贡献(刘昊和陈工,2020)。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工作,探索房地产税、遗产税的实施时机和空间,构建地方财源税收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为政策实施创造条件。

第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扩大内需和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推动一般性转移支付直达地方基层,合理安排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转移支付向国家政策支持的后地区 and 重点区域倾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体系,匹配地方各级政府的财力与支出责任,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分担比例、常住人口规模等因素,合理安排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资金,推动实现地区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保障公民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

本公共服务。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建立政府成本管理体系,以标准成本核定财政预算,以投入产出评价预算绩效,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政支出,切实保障民生事业支出。尤其在疫情冲击的影响下,各级政府财政继续维持“紧平衡”状态,合理缩减政府行政支出规模,压降不必要的“三公经费”、违背市场规律和竞争原则的低效产业补贴政策,对维持财政安全、转变政府职能都有益处。在我国整体城镇化率水平较高、城市基础设施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支出重点应转向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事业领域,构筑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降低居民支出分担比例,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支持新发展格局构建,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平发展和阶层流动机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完善政府投资机制。政府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的重要财政政策工具。需完善政府投资机制,尤其在重大疫情下,要加强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监督,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并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在《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及财政部门的相关制度规定下,建立覆盖“投资决策、预算管理、债务融资、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资金归还、审计监督和绩效评价”全流程的政府投资科学决策机制,解决好“投什么”“投多少”“怎么投”等问题。

第五,政策工具多管齐下。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扩大内需时,要在政府投资、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领域全面部署,也要支持扩大出口,通过外需拉

动增长,进而带动内需。在政府投资领域,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扩容利用;在一般消费领域,可以直接给家庭发放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在汽车购买和刚性住房需求等方面,可以通过契税减免和加大公积金贷款额度给予支持;在企业投资领域,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增加企业现金流,对国家重点支持的先进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实行增值税加计抵扣,以及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所得税的加计抵扣力度(朱江涛,2022);在出口领域,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和提高出口退税力度,缓解外贸企业面临的困难,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 [1] 巴曙松.2009年扩大内需政策可能面临的难题和挑战[J].资本市场,2009(5):16-17.
- [2] 陈工,刘昊.加快促进财政金融协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4-21(3).
- [3]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56(11):4-13.
- [4] 刘昊.基层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及市场化转型——以W市H区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21(3):24-34.
- [5] 刘昊,陈工.财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及支持举措[J].地方财政研究,2020(11):4-9.
- [6] 刘尚希,傅志华,李成威,陈龙,申学锋.全面认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问题的重要论述[J].财贸经济,2022,43(2):5-17.
- [7] 王建.什么是国际经济大循环[J].四川建材学院学报,1988(3):24.
- [8] 王一鸣.积极扩大内需 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4):16-21.
- [9] 周文,施炫伶.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3):3-23.
- [10] 朱江涛.创新税收政策工具 大力刺激消费投资.[N]南方日报,2022-06-28(14).

【责任编辑 郭艳娇】